

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

計畫名稱：史記論贊研究—附歷代評論輯要（Ⅱ）

計畫編號：NSC88-2411-H-002-018

執行期限：87年8月1日至89年1月31日

主持人：李偉泰 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

一、中文摘要

司馬遷著述《史記》的宗旨，以他在〈報任安書〉中所說：「亦欲以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。」數語最為賅要。但他並沒有把一家之言作集中的表述，而是散見於《史記》各篇的記事與論贊之中，其中又以論贊為主。本研究即以這些論贊作為探究的對象，藉以呈現司馬遷的思想內涵，以及《史記》作為一部史書的優點和缺點。

關鍵詞：1. 史記 2. 論贊 3. 司馬遷

Abstract

Shichi is a book highly regarded as facts recorded. The author, Ssu Ma-chien, would not be satisfied to identify himself as a facts recorder; yet, he tried to find ou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being, the rule of change, to build up his own-theory of history.

Ssu Ma-chien described his theory now and then in Shichi among scattered events and comments, instead of one whole systematically. This project will focus on Ssu Ma-chien's comments on history to find out his thoughts, and to evaluate the contribution and limitation on Shichi.

Keyword: 1. Shichi 2. comments on history
3. Ssu Ma-chien

二、緣由與目的

已見於第一年的成果報告，此處從略。

三、結果與討論

本計劃分兩年進行，就論贊的研究而言，第一年以本紀、表、書、世家，即前六十卷為主；第二年以列傳，即後七十卷為主。

第二年所獲結論，就細部而言，自非本報告所能容納。就宏觀而言，約有下列數端：

1. 《史記》論贊由四個部分組成：①全書卷末〈太史公自序〉後半為一百二十九篇所寫的序，通常習稱之為〈自序〉。②篇前冠以「太史公曰」的稱之為「序」。③篇末冠以「太史公曰」的稱之為「贊」。④此外尚有包含大量議論之「論傳」，如「天官書」之贊、〈伯夷列傳〉、〈太史公自序〉前半均是。司馬遷在這四個部分靈活的補述史實、以及或隱或顯的發表論斷，所以就研究《史記》各篇的旨意，乃至司馬遷的「一家之言」，這四個部分具有互相補足的作用，因此都很重要。以往學者比較忽略〈自序〉的地位，致使許多人不能充分利用其中資料，這是極為可惜的事。例如以〈商君列傳〉來說，後人熟知的是贊語中司馬遷評其為「少恩」、「天資刻薄人也」；及傳文中趙良一大段可以歸類於「寓論斷于敘事」，全盤否定商鞅政績的議論。這樣看來，似乎司馬遷不但強烈厭惡商鞅的為人；而且同趙良一樣，全盤否定商鞅的政績。然而事實並非如此，司馬遷在〈自序〉中客觀的指出：商鞅在秦，「能明其術，彊霸孝公，後世遵其法。」呈現了他作為一位「良史」，《史記》作為一部「實錄」的面貌。但是〈自序〉的話也不能過分放大，例如張大可在引述〈自序〉之後說：「司馬遷作

〈商君列傳〉，就是肯定商鞅變法。」（見張氏所著《史記全本新注》）對照贊語及傳文中趙良的議論，可以清楚的看出張氏的話不免「斷章取義」之過。又如〈蒙恬列傳〉，贊語對於修築長城問題，責備蒙恬阿順始皇之意，輕用百姓之力。〈自序〉則肯定此舉在開拓領土，北服匈奴方面的功勞。又如〈晁錯列傳贊〉說：「晁錯為家令時，數言事不用；後擅權，多所變更。諸侯發難，不急匡就，欲報私讎，反以亡軀。語曰：『變古亂常，不死則亡。』豈錯等謂邪！」對於晁錯的冤死，採取幸災樂禍的態度。對於晁錯削弱諸侯，鞏固中央集權的措施，以及各種法令的更定，指為「擅權，多所變更。」「變古亂常」，完全抹煞他正面的積極作用。這反映了司馬遷主觀上不喜歡銳於革新的政治家。但在〈自序〉中他卻指出晁錯「不顧其身，為國家樹長畫。」這反映了他「良史」「實錄」的一面。總之，《史記》論贊的各個部分，為了避免重複，彼此的重點勢必有所不同，必須相互參照，才能完整的把握司馬遷對某一個人物或事件的看法。

2. 不僅各篇論贊的各部分之間必須互相參照，有時還必須參考全書其他的相關部分。例如關於晁錯，司馬遷在〈吳王濞列傳贊〉中，肯定晁錯削藩的作法是「為國遠慮」，與〈晁錯列傳·自序〉的說法遙相呼應，都是對〈晁錯列傳贊〉充滿主觀好惡色彩說法的修正。又如〈魏公子列傳〉，司馬遷將信陵君刻畫成一身繫魏國安危的人物，從魏國來看，確是事實。但在〈魏世家贊〉中，則說：「說者皆曰：『魏以不用信陵君，故國削弱至於亡。』余以為不然。天方令秦平海內，其業未成，魏雖得阿衡之佐，曷益乎？」從國際大勢看，這話也不錯。參照兩處，可知國際的大形勢，不是一個人、一個國家一時力量的凝聚所能改變。金末元初田天澤有一首〈蘭相如墓〉詩：「翠疊峰巒步障新，上卿廟貌萬年春。可憐完璧歸趙後，故里蕭蕭也入秦。」同樣說明客觀的國際大形勢，不是某一國家少數有才之士所能轉移

的。又如〈六國年表序〉，對秦的評價前後不一，先貶而後褒。序文一開頭即指出秦襄公始受平王之封，就祭上帝，顯現了僭越的苗頭，因為依照禮制，只有天子才可以祭天地。其次批評秦國雜有戎、翟之俗，重武力而輕仁義。比較來看，秦國有德義的人君，還不如魯、衛的暴君。但是後文卻對秦國的成功，以及漢朝「法後王」的作法極力加以肯定，與前文負面的評價形成強烈的對比。對於這種現象，方苞認為是志痛的詭辭（見〈書史記六國年表序後〉）。換句話說，這是一種「曲筆」而非「直書」。要證明方氏的說法，必須解決兩個問題：其一，《史記》有沒有用到「詭辭」或「曲筆」的時候？其二，司馬遷對秦朝是持褒揚還是貶抑的態度。關於前者，司馬遷在〈匈奴列傳贊〉中作了很清楚的說明：「孔氏著《春秋》，隱、桓之間則章，至定、哀之際則微，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，忌諱之辭也。」指出孔子著《春秋》，對於當代的人事不能不委婉其辭，為避禍之需；說明他寫《史記》時，也不能不因有所顧忌，使用隱微其辭的曲筆，以免觸犯忌諱。關於後者，從〈項羽本紀〉的〈自序〉及贊語表章項羽滅秦之功；〈陳涉世家·自序〉將陳涉起義與湯、武革命，孔子作《春秋》相提並論，則司馬遷將其對立面之秦皇、二世，視為桀、紂之同類可知；司馬遷取賈誼〈過秦論下〉為〈秦始皇本紀贊〉，取〈過秦論上〉為〈陳涉世家贊〉（用瀧川資言《史記會注考證》說），作為對秦朝的間接批判。綜上所說，司馬遷反秦的立場是很明白的。然則他為什麼在〈六國年表序〉後文使用曲筆，為秦朝的「成功」辯護？原因在於漢沿秦制，單就制度面來說，漢朝建國，不啻是秦帝國的變相復活。也就因為這種微妙的情形，使得司馬遷不能不有所忌諱，不能不用曲筆隱微其辭。凡是這類比較複雜的事件，均須參照全書相關部分，才得以窺見事實的全貌。

3. 為了充分認識《史記》在記事和議論方面的得失，《史》、《漢》記事重疊的部分，

不能不參考《漢書》。以賈誼為例，在《史記·屈原、賈生列傳》中，司馬遷著重描寫兩人的忠心而遭貶謫，及與這種遭遇相關的作品（在〈屈原列傳〉錄〈漁父〉、〈懷沙〉，在〈賈生列傳〉錄〈弔屈原賦〉、〈服鳥賦〉）。關於賈誼的政見，著墨不多。賈誼最重要的政論文章〈治安策〉（或稱為〈陳政事疏〉），《史記》只簡單提到必須抑制諸侯：「賈生數上疏，言諸侯或連數郡，非古之制，可稍削之。文帝不聽。」除去前後二句，實際上只有三句而已。再就論贊而言，《史記·自序》未提賈誼，贊語中只提到賈誼的賦，不涉及他的政治見解：「及見賈生弔之，又怪屈原以彼其材，游諸侯，何國不容，而自令若是。讀〈服鳥賦〉，同生死，輕去就，又爽然自失矣。」可見〈屈原·賈生列傳〉實以屈原為主角，賈誼不過是從屬的配角而已。反觀《漢書》，不僅單獨為他立傳，除保留《史記》的記事及所錄的〈弔屈原賦〉和〈服鳥賦〉外，又增收〈治安策〉、〈處置淮陽各國疏〉、〈諫封淮南厲王諸子疏〉，同時又在〈食貨志〉中補錄〈論積貯疏〉和〈諫除盜鑄錢令疏〉。在〈敘傳〉和贊語中，班固肯定了賈誼作為政治家的地位和遠慮。前者說：「賈生矯矯，弱冠登朝。遭文獻聖，屢抗其疏，暴秦之戒，三代是據。建設藩屏，以強守圉；吳楚合從，賴誼之慮。」後者說：「劉向稱『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，其論甚美，通達國體，雖古之伊、管，未能遠過也。使時見用，功化必盛。為庸臣所害，甚可悼痛。』」追觀孝文玄默躬行，以移風俗，誼之所陳，略施行矣。及欲改定制度，以漢為土德，色上黃，數用五，及欲試屬國，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，其術固以疏矣。誼以天年早終，雖不至公卿，未為不遇也。凡所著述五十八篇，撮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。」班固還是不能充分認識賈誼的遠見和卓識，不過這是另外的問題。單就記事的客觀、全面、正確，《漢書》遠遠超過《史記》，議論方面，也遠比《史記》周全。此外，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〈匈奴傳〉的贊語，也是必須

加以比較，才能明白二者的得失。《史記·匈奴列傳贊》說：「孔氏著《春秋》，隱、桓之間則章，至定、哀之際則微，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，忌諱之辭也。世俗之言匈奴者，患其微一時之權，而務譎納其說，以便偏指，不參彼己；將率席中國廣大，氣奮，人主因以決策，是以建功不深。堯雖賢，興事業不成，得禹而九州寧。且欲興聖統，唯在擇任將相哉！唯在擇任將相哉！」以上所說，茲分三點說明：①、自「孔氏著《春秋》至「忌諱之辭也」，表明自己在下筆之時有所忌諱。這個忌諱，就是不便斥責擇任將相的武帝缺乏知人之明。②、自「世俗之言匈奴者」至「是以建功不深」，指武帝採納王恢的建議，以馬邑伏兵之計，揭開對匈奴作戰的序幕；但在決策的時候，既不能做到知己知彼，同時也沒有進行長期作戰的準備。③、自「堯雖賢」至「唯在擇任將相哉」，言外之意在批評武帝用人不當。不過漢、匈對抗涉及的因素極為廣泛，以用人不當作為「建功不深」的唯一原因，不免空疏之失。《漢書·匈奴傳贊》，不連標點符號，計一二五四字，是班固刻意經營的史論。由於文章很長，不便在此引錄，以下只能略述其中大意：班固歸納以往漢朝對付匈奴的策略，不外和親、征伐二法。根據歷史往事，和親的辦法無效，不但不能阻止匈奴寇盜，反而助長單于的驕氣。征伐的難處，包括動員、後勤補給、糧食運輸、氣候及水土的適應、輜重多少與軍隊行動的快慢不能兼顧。以現代的觀點來詮釋，對付匈奴的難處，根本的原因在於農業和游牧兩種文化的差異，使得農業民族即使在國力強盛時，也不可能長久佔領、利用草原地區，這正是攻勢國防難以長久持續的原因。在這種客觀條件限制之下，班固提出來的備胡方針是：胡人入侵則加以懲戒性的抗擊，離去則妥善的守備，同時以禮讓善待入貢的國家，這是軍事、外交並用，剛柔相濟的方法。綜上所述，班固的分析，遠較司馬遷詳盡；所提對策，也遠較司馬遷具體而確實。所以連經常偏袒司馬遷的李景星，也在《漢書評議》

中比較二者的優劣說：「《史記》原贊未免空疏，班氏擯而不用，另為撰出，其筆力之奇變，不待言矣；末論御外之道，雖聖人復起，亦莫能易。後人謂班氏有勝於馬者，此即其一。」的確是很公道的話。總之，為了充分認識司馬遷的長處和局限性，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的比較工作是不可或缺的。

四、計畫成果自評

本研究計畫與本人在台大中國文學系及研究所開設之課程：「史記」、「史記研究」具有密切之關係。自八十六年九月簽訂第一期計畫執行同意書及開始上課後，即於課前準備時，陸續草擬《史記論贊分篇研究稿》，並利用每週上課之部分時間，與助理及學生討論《史記》各篇論贊之用意及得失，頗得教研相長之樂趣。

《史記》論贊分篇研究的篇幅，以精簡為原則，部分問題較為複雜，則另行撰寫單篇論文。其中如〈試論司馬遷貶抑蕭何的原因〉，討論對象主要為〈蕭相國世家贊〉及〈淮陰侯列傳贊〉，八十六年十二月，本人參加「香港大學中文系七十週年紀念國際

學術研討會」，即在會上發表此文。又如〈史記敘事何以始於黃帝諸說述評〉討論對象主要為〈五帝本紀贊〉，八十七年四月，黃帝陵基金會與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在西安合辦，「黃帝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」，本人即在會上發表此文。再則如《試論〈史〉表的若干疑義及司馬遷的用意：一、〈三代世表〉的兩個難題及其用意。二、〈六國年表序〉立論前後不一及其原因》，發表於八十八年三月，台大中國文學系第二五七次學術討論會。又如〈漢書對史記的補正—以關係匈奴的事蹟和議論為例〉，發表於八十九年五月，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，「第三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」。

無論是長篇論文，或短篇的論贊分篇研究，因為都是建立在原典的精讀與廣泛參考古今學者議論的基礎上，所以即使其他學者有見仁見智的不同看法，相信仍將無礙於本研究的參考價值。

五、參考文獻

見第一年成果報告，此處從略。

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（附件）

赴大陸搜集資料及與同行切磋報告書

計畫名稱：史記論贊研究—附歷代評論輯要（Ⅱ）

計畫編號：NSC88-2411-H-002-018

執行期限：87年8月1日至89年1月31日

前往大陸期間：88年9月4日至18日

主持人：李偉泰 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

88年9月4日：赴廣州。

9月5日：赴中山大學，上、下午與該校歷史系教授曾憲禮先生詳談，交換對《史記》研究的看法。

9月6日：由廣州赴西安，西北大學教授柏明先生及圖書館人員至咸陽機場迎接。抵達該校後，託副館長賈希鳴先生影印若干資料。

9月7日：上午至西北大學圖書館閱覽善本書。下午與西北大學同道共赴陝西師範大學，與該校中文、歷史、哲學等系教授，及司馬遷研究會同仁座談：一、《史記》研究面面觀。二、儒學在現代的傳播問題。當晚以〈玄機處處說留侯世家〉為題，在西北大學文博學院發表演講。

9月8日：上午訪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石興邦先生，石先生為大陸考古學界「大老」之一。接著參觀陝

西歷史博物館。晚上在「老孫家」清真館宴請西北大學及陝西師大同仁，席開兩桌，答謝數日來盛情之款待。

9月9日：由西安赴北京，當晚與楊燕起先生交換對《史記》研究之看法，楊氏係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，大陸研究《史記》著名專家之一。積多次個別交流、多人座談之經驗，發現個別交流較能集中並深入研討問題。

9月10日：上午赴人民大學訪葛榮晉教授，並由葛教授陪同前往圖書館查閱善本書。下午至北京圖書館訪善本特藏部主任黃潤華先生，並閱覽善本書。黃先生曾訪問台大中文系，並與系中同仁座談。當晚訪中央民族大學牟鍾鑒教授。

9月11日：上午北京東方道德研究所所長、首都師範大學研

究生導師王殿卿教授來訪，就傳統文化之推廣充分交換意見。下午與陳其泰先生交換對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研究之看法。陳氏係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教授，為近年來能夠重視《漢書》成就的少數大陸學者之一。

9月12日：訪問國際儒學聯合會，並與該會學者座談儒學之研究與推廣工作。

9月13日：赴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訪該所所長陳祖武先生，並至該所圖書館閱覽善本書。

9月14日：由北京赴上海，當晚與周振鶴教授餐敘，交換對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研究之意見，周氏係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，精研漢代史地。

9月15日：日間至復旦大學圖書館閱覽善本書。中午與吳格館長餐敘，晚上與朱維錚教授談論經學研究之問題，並相談甚歡。

9月16日：至上海圖書館訪該館古籍部主任陳先行先生，並閱覽善本書。老友孫遜教授之研究生柳岳梅小姐在該部門工作，招呼甚周到。

9月17日：續至上海圖書館閱覽善本書。

9月18日：由上海返抵台北。

就個人所往訪之各大學及研究機構圖書館而言，善本書之保存均甚為完好。據工作人員告知，一來係因使用樟腦丸驅蟲，或將珍貴圖書置於樟木箱中；二來則因氣候較為乾燥之故所致。在大陸各地辦事，人事關係甚為重要。此行由於與往訪對象之負責人均有直接或間接之朋友關係，故處處均受到特殊之禮遇。既感友人之盛情，同時亦不免為此一現象而深有所思。